

申观察

从追花人到守护人 一群「都市牧蜂者」的生态突围

蜂鸣渐隐处「甜蜜事业」谁传承

本报记者 李一能

芳菲四月,明媚的春色中,上海进入了百花争艳的赏花季,周末郊区绿地游人如织,享受着惬意的时光。郊外的田垄暖棚间,各类瓜果鲜蔬也正在茁壮成长,孕育着即将到来的丰收时节。这一生机勃勃景象的出现,养蜂人和他们的蜜蜂功不可没。

养蜂曾是上海郊区非常普遍的副业之一,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崇明、浦东、金山等地蜂农的身影曾遍布中国大江南北,他们跟随着花期寻找蜜源,让上海的蜂产品畅销全国甚至远销海外。随着时代变迁,上海养蜂业逐渐式微,养蜂人也面临着逐渐老去、后继无人的局面。如今,上海只剩下200多位本地养蜂人,而这一数字仍在逐年递减,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是,对于农业与城市生态极为重要的养蜂业,将以何种方式传承下去?



老唐和他的蜜蜂

本版图片 受访者供图

奉贤区金汇镇南行旺苑,是个新建的居民小区。曾经的远郊乡野被一排排高层住宅楼所取代,农民们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宅基与田地上楼成了新市民,其中就包括73岁的唐吉臣,他是远近闻名的养蜂好手。

跟随着老唐,记者来到小区附近的空地,几个蜂箱放在不起眼的角落。“现在找个地方养蜂真不容易,经常被人赶来赶去。”老唐一边说着,一边在没有穿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打开蜂箱,只见密密麻麻数百只蜜蜂附着在巢框上,似乎对主人的打扰习以为常,并没有被惊吓

“现在养蜂赚不到什么钱了,性价比太低,只能随便养养补贴一些家用。”从鼎盛时期的两百多箱,到如今只在家附近养个十几箱“玩玩”,对于老唐而言,坚持养蜂已经有些力不从心,寻思着哪天彻底退休安心养老。既有些舍不得,但也无可奈何,这位从17岁入行的老蜂农,亲身经历了上海养蜂业兴衰的全过程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养蜂职业在上海农村极受欢迎,原因是收入极高。在人均二三十元收入的当时,一个蜂农算上补贴,可以月入一百多元,绝对属于高薪群体。而且作为世界主要产地之一,中国蜂蜜

闵行区浦江镇有一位养蜜蜂的意大利人,就是老唐心心念念的“接班人”。马可7年前来到上海,经营一家公司,也是蜜蜂公益志愿者。

浦江镇联民村有大片油菜花,马可在附近放置两个蜂箱,此刻他的蜜蜂正在花丛中辛勤工作着。很多村民感到很奇怪,一个老外为何在上海养蜜蜂?马可解释说,这纯属机缘巧合。在欧洲村镇,家庭养蜂很常见,人们会养一些蜜蜂为农作物授粉,顺便生产一些蜂产品自用或售卖,他从25年前就开始养蜂,



养蜂人马可

公众缺乏了解

到,只是埋头忙碌着自己的“工作”。

老唐与蜜蜂打了五十多年的交道,眼前这些意大利蜜蜂(简称“意蜂”)是养蜂业首选,引入中国后迅速普及。旁边一个较小的蜂箱,则是养殖本地品种中华蜜蜂,被称为“中蜂”。相比之下,两者各有特色,“意蜂”性格较好,不太主动蜇人,体形较大,采蜜量非常高。而“中蜂”性子较野,体形较小,采蜜量不如“意蜂”,优点是比较好养活,对病虫害的抵抗性较强,且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也能

持续采蜜,因此几种特定植物的采蜜与授粉只能由“中蜂”完成。

“不管是‘意蜂’还是‘中蜂’,不了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害怕,所以养蜂只能在远郊。”老唐说,以往上海农村并没有这个问题,但现在随着城市扩张,城市与郊区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,很难找到纯粹意义上的远离人群的养蜂场所。被投诉、被举报、被赶来赶去,对于养蜂人而言已是常态,老唐苦笑说他们到处被人嫌弃,原因在于公众对于蜜蜂

的了解极为缺乏,殊不知这些小生物对于人类的生活极为重要。

70%的开花植物要结果,都需要昆虫授粉,蜜蜂就是主要的传粉者之一,而黄瓜、草莓、西瓜、生梨等重要经济农作物都需要蜜蜂。在绿色生态种植被格外重视的当下,利用蜜蜂而非人工授粉成了趋势。老唐除了养蜂卖蜜之外,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种植业提供授粉服务,例如近期许多草莓种植户就排着队找他,服务供不应求,原因是本地蜂农太少了。

见证鼎盛时期

是那时非常重要的出口创汇农产品,国家对发展养蜂业极为重视,老唐就是在那时入行的,成了一名生产队的养蜂人。

每年春季,老唐便会带着蜜蜂坐火车赶花期,开始一场纵横中国南北的采蜜之旅,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云南到东北寻找蜜源。生产出高品质的蜂蜜以及蜂王浆,养活一家老小的同时也为国家赚到了宝贵的外汇,“为国养蜂”的自豪以及传承自老一辈蜂农的职业操守,让他对于自身专业以及产品质量的要求极高。

随着时代变迁,上海的养蜂业逐渐衰退。主要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百业兴起,农业人口大量转移到别的行业。此外,随着蜜源产地的减少、农药的使用,以及一些不法商贩的弄虚作假,以次充好,使得当时国产蜂产品的口碑和品质在国内外出现了垮塌,至今也难以完全恢复到巅峰时的水准。同时,养蜂人的收入也直线下降,作为当地最优秀的养蜂人,老唐最高一年收入只有10来万,和刚刚入行时相比工作性价比降低不少。

“辛辛苦苦,起早摸黑,还要被蜜蜂蜇,一年到头也赚不到多少钱,很多人连销路都成问题。”老唐的子女孙辈没有一人继承他的衣钵,难得到找到一个徒弟,免费提供蜂种,把自己的心得倾囊相授,但最后徒弟还是坚持不下去。去年老唐参加了上海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举办的培训班,得知全上海有证的养蜂人只剩200人,而且年龄都很大,班上最年轻的学员也有60岁。

“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养多久的蜜蜂,可能再过几年就会彻底退休吧。”老唐说,还是希望会有年轻人对养蜂感兴趣,成为他们的接班人。

意大利志愿者

开始主要是为了给自家的果树授粉,后来逐渐发展为兴趣爱好。

来上海后,马可原以为养蜂生涯就此结束。2023年,他又在闵行郊外农场养了两箱中华蜜蜂,开始是为了好玩,后来当地政府找到他,问他能否帮忙授粉,而身边一些朋友也对养蜂很感兴趣,周末会带着孩子来参观。马可突然发现,养蜂的爱好似乎又能派上用场了。

去年马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

为“Urban Bees Shanghai”(上海城市蜜蜂)的非营利性志愿者组织,与高校和政府部门开展合作,在上海各区设立维护多个蜂箱,特别是本地蜜蜂。在马可看来,建立这一兴趣社群,除了助力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与支持植物生长,更可开展公众教育宣传。“其实不仅是上海,全世界养蜂人的平均年龄都偏大,吸引年轻人加入尤为重要。”马可说,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流行着一个俚语

叫“养蜂年龄”,特指40至50岁充满魅力的成熟男性,但也体现了养蜂行业下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。

周末节假日,“上海城市蜜蜂”经常会开展社群活动,例如邀请家庭来到农场参观,在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近距离接触这些“授粉小英雄”,或向志愿者传授养蜂技巧。目前,组织已经在上海各区拥有20个蜂箱,并吸引了1500名粉丝,其中有不少年轻人成为了潜在的下一代“城市养蜂人”——基本脱离商业活动,以兴趣爱好来养殖蜜蜂。

实现科学平衡

“我与中国同行交流,都觉得在城市养蜂是一种挑战,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城市的扩展与公众对于养蜂重要性缺乏认知。”马可说,对于蜜蜂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会蜇人,其实大部分人工饲养的蜜蜂脾气比较温和,极少会主动攻击人,只要掌握一定技巧和做好防护,是可以避免危险发生的。此外,他在上海的七年中,目睹了城市扩展,越来越多的郊野已经或正在城市化,绿地公园虽多,但人流量也大,适合放置蜂箱的位置越来越少,人群与蜂群如何实现和谐相处,成了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“其实即便在城市,一些高层建

筑的楼顶露台,是比较适合放置蜂箱的位置,那里远离人群,能为周边大片面积的植物授粉,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部门和公众的支持。”马可说,他希望学校能开设蜜蜂教育相关的课程;政府部门也能重视扶持养蜂人,鼓励人们养殖蜜蜂,或是与他们这类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授粉或科普活动;公众则能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蜜蜂。马可说,因为爱上海,他想为它作些贡献,他很高兴自己的养蜂技能帮上了忙。

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汤亮告诉记者,近年来随着上海生态环境的改善,野生中华蜜蜂

种群数量开始回升,它们对一些本土原生植物的授粉能力比意大利蜜蜂更强,但问题是这些小生物非常脆弱,动不动就会被“团灭”,加上市民对所有蜂类都比较害怕,许多野生蜜蜂巢往往被当成马蜂窝给“一锅端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养蜂人为农业和植物授粉提供稳定的渠道,是城市生态链极为重要的一环。

“城市需要蜜蜂,但又不能扰民,这就要通过科学管理与专业介入来实现平衡。”汤亮说,在职业养蜂人群体萎缩的当下,兴趣养蜂人接过这面旗,这肯定是件好事,代表着上海在生态与昆虫教育上取得的成果。“不起眼的小昆虫也是大自然重要一环,蜜蜂更是重要的人类之友。”